

畜界，人界

一个文本主义者的随笔集



钟鸣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畜界，人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畜界,人界/钟鸣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08-09181-8

I. ①畜… II. ①钟…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039588号

策划编辑 刘志凌
责任编辑 沈宇
装帧设计 杨林青工作室



世纪文景

畜界,人界
钟鸣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25,000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181-8/I·780

定 价 32.00 元

人们熟悉龙，却不一定谙熟龙的儿子，有九个，虽不成气候，却各有所好：老大叫“囚牛”，是龙的家族中惟一喜欢音乐的，所以被刻在胡琴上，但奏的是老调调；老二叫“睚眦”，传说嗜杀成性，故铸刀把子上；老三是“嘲风”，喜欢冒险，被泥瓦匠放在古建筑的殿角上；老四是“蒲牢”，方口厚唇，酷爱呼口号，发嗷嗷之声，十分精致，几成铜钟上的兽纽；老五“狻猊”，平生好坐，佛祖见它有耐心，便收在胯下当坐骑，但余襟良弹，未必是一种解脱；老六“霸下”，素来喜欢负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乐意扛重物，匡乱扶正，龟趺类，但跻身彼座，兴邦为政，却未必勇猛，所以重也重不到哪儿去，古碑残阙下常看到它；老七“狴犴”，乐在诉讼，定期整肃，变着花样，现在零落，但也死不了；老八叫“负屃”，最得意舞文弄墨，欢呼歌舞升平，一切圆滑，柔荑粉颈，很讨老龙欢心；老九是“螭吻”，好吞好吃，属老饕之类。这九条藏头露尾的解形之人，究竟谁是谁呀！*

*这段题记，是由古代的笔记小说引申附会而出，已记不清楚竟出自何书，想必是《酉阳杂俎》、《墨客挥犀》、《闲居杂录》一类。二十年一过，便难觅踪迹，如龙出飞舞而后再蛰，也无关紧要。传统手法古已有之，如宋人李石《续博物志》所言，“相家说，人臣得龙之一体，当至君相。曾公亮得龙之脊，王安石得龙之睛”，若有新酒，大家饮来岂不快活。我无非传统间施些小伎俩，至微而响，引人入胜，不过尔尔，命中若有终须有。本文为文艺随笔，可归现代“志怪小说”，志在拓展作家和读家的想像力，此为新文学、唯物运动以来最需补短处，虚实之间，若得文字与思想的乐趣，便足矣，有好事者甚至还曾认真考察起是否真有“龙之九子”，劝不必费力纳入学术，惊为“咄咄怪事”，更无须对号上纲，唐突西施一下又何妨，言者无罪，否则社会之宽容、进步从何而降。

那一年很寂寞，枯守着龙之灰，那年是龙年……¹

1989年，对中国来说，是个深梦——就像弗洛伊德描述俾斯麦的“阿尔卑斯山小径”²，但至今我们还必须躺在上边，不能卸鞍，而对于1919年来说，那却是个镜像，或反像。内在的隐秘关系，精神的也好，政治的也好，一脉相承与否，是不是坏血统，尚待温故知新，终无法推诿。那年，我对两件事记忆犹深：爱死灰复燃，又旋即熄灭——跟两条精神矍铄的鱼，侥幸蹦到岸上喘口气赶忙闷回水里一样（此故事我在《旁观者》聊过），就方位而言是美洲；再就是，很偶然我开始了随笔写作。这两者又都是被当时更隐蔽的环境“敦劝”着发生的。回顾这些，对我本人有点意义，否则随着岁月的流逝会更模糊不清，倒不一定非要去象征什么——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文学为此所赋予的幻想，挥之不去。

我个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新诗运动，从1915年的《新青年》，从胡适1920年的《尝试集》到1989这年，是真正的一个回合，我周围有许多诗人不同程度地被灼过，触动过，为“知己者”死也死过，都曾像高尚的兰波一样开始都把“美”抱在膝盖上，然而，真相越多，悻悻然

就越烈，或羞愧地投去一瞥，哀怨的，革命的，爱恨交加，折射出与众不同的时间之光——甚至也都不一定凝眸小觑。这些“君子好逑”³诗应该包括柏桦的《琼斯墩》⁴，小翟的《午夜的判断》⁵，周瓛的《爱猫祭奠，我们的一年》⁶，北岛的《白日梦》⁷，数不胜数，特别是张枣的《卡夫卡致菲丽丝》⁸，关于它，我们有过许多碰撞和讨论，也评论过，我有首《画片上的怪鸟》就是写给他的，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孤零零地去救命或被救……”⁹而现在他却刚病故德国，死于自己的本命年，虎年，谁也救不了。1999年，他在赠给我的诗里写道：“我们相隔万里谈着虎骨”¹⁰，现在不是“虎骨”，而是“知己者”，甚或不仅仅是寻知己者，这点，不用说大家都心知肚明一定是失望的，彼此失望，传统先天性地被破坏掉了，只能是一种心愿。要论诗歌的进步，除了“词”的胜利，就人性方面，我看是非常晦暗的，犹如骨鲠在喉。

一百年来，在干预社会方面，文学并不能造就“好人政治”，这点已经明了，甚至都不能保证自己随时随地的心地善良，明智，并维护其纯洁，对纯洁的理解，诗人也因自身的进阶大为不同。或许都是犬儒主义的对抗，也就是颠覆性的响应。或许，文学革命本身就是破坏其纯洁的，如果，它需要一场那样的群众运动。所以，胡适的意义，到后来，也真正只有“尝试”的意义，即先生反放翁语说的“自古成功在尝试”¹¹，跟波德莱尔的说法相似。波德莱尔在给母亲的信中曾写过：“我已对生活充满希望，我喜欢了解可靠、有趣的事情，以使自我满足。有些可怕的事朝我说‘决不’，而另外一些事却说‘试试看’。”¹²惟一的出路就是尝试着去做。两人——或许所有的诗人也都在寻找“虚伪的读者”¹³——因为读者嬗变，不得不变。

一个《尝试集》，一个《恶之花》，谁更不朽，这里，没有能量守恒的问题，只有不朽母语的蜕变、似曾相识环境的潜移默化、螺旋形发展的历史、万变不离其宗的国民性，这点，少年狂的先生，在“骂”与“学

骂”中，就胡先骕的“必死必朽”已展开过¹⁴。一个说征兆，一个说解放，现在看来，两者恍惚都在解除彼此的魔咒，而又波及自身、国家，汉语——混淆不清，或许，恰恰就是拉康所谓左翼右翼的游戏——即“傻瓜”和“无赖”：前者，头脑简单，天真无邪，说出真理容易被采纳认可，就因为他身上穿着小丑的服装；后者，尊古守旧，干脆称自己是恶棍，对前者的“乌托邦计划”冷嘲热讽¹⁵，而两者的言语效力，对当时的政治社会，都是个补充。那毕竟是在一个混乱、变态、腐败的时代，出发点不同，各执一词，都做着“不得已的事”，跟当时的学生运动想匡正时局乃是不得已的事情一样，但转捩之功，必为转捩之功。趋于平淡，最后不忍卒读，也确实不因活文字，而是因为浮出了其他陆岸，这点我有切身的感受。

在八十年代，我们那个小圈子里最爱谈的一个话题，就是那代人中——包括了自胡适到“现代派”¹⁶、“九叶派”¹⁷，或郭小川、臧克家、艾青那辈中所有诗人，孰重孰轻，谁高谁低。自然，这种说法，很感性，十分小儿，因为弃了文学史、历史学、社会学或批评自身的诸多坐标，是没法谈的，那只属于个人的情感判断，而非真正的价值判断——韦伯关于这点有精辟的论述（见其《社会科学方法论》）¹⁸。不过，扯出此话题事情本身倒是蛮真实的。在我能聆听的范围，在我记忆中，包括我个人的认同，大概翘楚者不是吆喝引车卖浆者语的胡适，也不是三天两头闹恋爱的徐志摩，唯美的邵洵美，现代派的穆旦——他的同学说他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一个上帝，但这个上帝却无用——女神的郭沫若，在死水中终未浮上岸的闻一多（他最博学的文章包括在《神话与诗》中），或繁星闪烁的冰心……当然，更不会是随波逐流、未摘儒冠之辈，而恰恰是从圆宝盒中翻出珍珠和鱼目的卞之琳¹⁹。短短一首《鱼化石》改掉了硬译化用的风格病（第一首白话诗恰恰是胡适的译文）和李金发似的“错乱”（这种错乱也让“朦胧”生疑）²⁰，一首《距离的组织》更未辱

白话文学的革命，否则，会输得很惨。

这首诗首次逃离了文坛时尚及趋同感——对恋爱、民众、沉沦、副刊论战和好人政治的幻想，却秉持“新闻性”或“新闻嗅觉”，虽避免了充当“硫磺火柴作家”，倒也作了小小的即兴爆炸，但却是被别人拧着腿撞向报章杂志的，涉及还要很后来由麦克卢汉²¹、波德里亚²²一类所涉及的话题——地球村，媒介，触觉，信息，晕眩，加速度，内爆，拟像：

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

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

报纸落。地图开，因想起远人的嘱咐。

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茫了。

（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吧。）

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

哪儿了？我又不会向灯下验一把土。

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

好累呵！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

有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²³

这种由新闻媒介引起的疏离感，正是现代人的。许多人或许会同意我的看法，慧识卞氏的特别，但子丑寅卯不一定厘清，不光是技巧问题。依照麦克卢汉的传播观念，电力的内爆——电动机、马达、电灯、喷射机、电视、印刷术只是电力的物质表现形式，在落后的口语式、部落式的文化地区和发达的文字化的西方地区所聚集的能量是不一样的。虽然，都可能朝着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但文字塑造出的人，会比部落型、口语式社会的人更单纯。因为，一致性的西方世界，是由分工的人以其

特殊技能和视觉记号造成，而口语式社会则由具有情感混合特征的人组成。这里，一个人的内在世界乃是一种复杂的情愫与感觉交织形成的混合体。新文化运动所有的参与者曾具有的那种混合与冲突，激进与失败共存的感知，说明麦氏的描述具有普遍的准确性。重实用的西方人基于效率和实用，早就摒弃了复杂的混合。是否社会分工的效力，尚待细察。

文字化的人，在电力分裂其文化内部后，马上就会转型为结构化的人，首要的标志即——他感觉到自己和人类社会中其他人相互依赖，电力技艺和传播造就了新人的尺度，传播工具也由此延伸。就像印刷术的回传，在当时的中国，才真正掀起了大众文化与写作的狂热，以反叛旧的文化形态。谭嗣同“君统盛而唐虞后无可观之政矣，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的激语²⁴，让文化交战更多的视线和决心落在了书写上，及传播的介质上。所以，老麦说：“一张报纸是一首共同的象征派诗歌，作为诗歌，它是环境的、隐性的诗作。”²⁵当时报刊林立，论战不休，连僧人也组织起来阅报，就像现在谣传的少林寺上市一样，传统文化分崩离析，这又刚好说明，传播媒介的文化内爆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和麻醉性。刚开始，并非所有人都能适应。胡适对自己诗的失望，不是因为他没有使用活的文字，或没技巧——技巧也确实很差，而是他的内心仍属于旧的口语式社会，用周作人的话说，就是“二元的”。所以，他的《尝试集》，文字流白，传达的信息则属旧式，用白话“酬谢酒宴”和用文言“报一饭”（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赏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没本质的区别，新瓶旧酒，难以支撑他所策动的新诗。故知己者所判的“六分学者，四分才子，二分盎格鲁撒克逊留学生……光彩照人，毫无阴险气”²⁶很准。不能成为诗人，乃因太理性，是推口话。

其实，除了个人气质主要还是大环境的问题，按麦氏观点，时值中国正从口语式社会转型为真正的文字式社会，而社会内陆深处，又积重难返，故复杂混合的特征在左翼右翼身上都表现出难以纠缠的局面，很

难见到完整的单纯性，到处都是文学膏药、革命口号、战斗檄文之类，文艺复兴也只是集体主义的幻想。波德里亚是对的——人造世界的面具形象，面具的影子，促使人们挑战，“是惟一允许行使政治权力的因素”²⁷。影子的斗争，持续至今。所以，一旦出现卞之琳那种凝而不古的句法，我们便知道文言白话之争，侥幸在这里落得果果实——或者半成品。读他的《记录》中“现在又到了灯亮的时候”，“从远处送来了一声‘晚报’”²⁸，思他《第一盏灯》对电力和文明的阐释²⁹，便知道，他的表达，有着必然性。他才是反隐蔽环境（麦克卢汉：鱼到了岸上才知道水的存在）而并非侥幸游到岸上的人。从他那里，文学至少暂时获得了白话文应该仰慕的某种单纯性。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任何社会，只要它存在，或它感觉到自己还是个正常运转的社会，它就会继续给自己的环境投资，传播的触觉四处渗透，造成新的面具世界。军事化社会往往使自己更加军事化，一个官僚主义社会往往使自己更加官僚化——那么，麦克卢汉在《致鱼书简》中提倡的艺术家的任务就很重要了：“如果没有一种反环境，一切环境都是看不见的。艺术家的角色创造一种反环境，使之成为感知和适应的手段。”³⁰ 哈姆雷特的装疯卖傻，就是给自己制造的反环境，以便施展侦探的技巧。但在中国的文坛，却见了更多的弄潮儿，聪明人，明白人，取彼者，舞文弄墨，功成名就，自诩反叛却在隐秘的结构中同流合污者，大量在否定之否定间滑动的文痞，可怜兮兮的保守派，狡猾的伪善者（契诃夫：文学上的伪善是最令人厌恶的伪善），假先知，更多的是求生者，因为职业，因为失落感，也因为青春，而成为平庸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或许，白话诗一出，就已宣告了自己的菁英破产，肇事者首当其冲。

关于反环境的“罗密欧”或“哈姆雷特”的典故，也频繁出现在许多人的诗中，熟悉的诗人，记得张枣写过，语言颇为蛊惑：“修长的

漂移的世界听到了这些呻吟，哦哦，这惟一的一夜，罗密欧换成了朱丽叶……”群众反叛最迷恋的就是抒情与迷惑，而迷惑者往往深不可拔——就像契诃夫在许多篇小说中反复讥诮的那种“入迷”，一系列的信仰和入迷，所以，许多年后，他语气中所透出的无可奈何也最多。最爱抒情的，也最容易泄气。瞧罗密欧、哈姆雷特泄过多少回气，并在泄气中怀疑，自残，那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捕鼠机。谁是捕鼠人，混淆不清的诗歌界线却被许多人划出了自己细细的界线，以为是清晰的——“朦胧”真是一个带刺的谏啊！

我也写过，单独写过？——记不住了，先是从哈姆雷特的反面奥菲莉娅，然后是哈姆雷特本人，《旁观者》中倒发挥过一大段³¹，最多也就是“哈姆雷特式”的，正像我后来在《涂鸦》这首诗中写的，“你捏的粉笔是哈姆雷特的样式”³²，当然不是哈氏粉笔，根本没这样的粉笔，或他的姿势，而是他的佯狂，假寐。连这点，也只牵涉到最表面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反环境和对真正罪恶的侦讯，除了词，还是词。把一个故事变成表面上的词，诗人最拿手。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就曾集体玩过一回。那次，我给另外三个诗人讲了现代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回忆录中关于意大利诗人邓南遮和金鱼的故事³³，记得正是张枣提议，大家以“邓南遮的金鱼”为题每人写首诗——就这样，一个古典的故事，一种忧伤，第二天变成了四首汉语诗，在我印象中，大家玩的都是哈姆雷特式的离间计——从词到词，最后还是词。这点给哈姆雷特本人一语道破。

当我游过一扇门时

门框突然变得格外狭窄

我的黑眼睛越是往外凸

白世界就越恍惚，问题越尖锐

或许这就是斯宾诺莎的原理

你睁大眼球，因为没思考

你就必须带着鱼的思考

鱼的生活方式，鱼的游猎

鱼一样的扁形思维，灰色的

而非亚里士多德逻辑式的

你得像个流浪汉在垃圾堆上跳舞

用门来讲述未来世界的传说

只是因为一点时间起了变化

只是因为通过脚灯样的鱼眼看到

一些热爱抽象事物的古怪的人

还有些鱼和用鱼眼思考的人³⁴

鱼眼镜头实际上是一味夸张，不能还原事物的镜头，表面上概括着更多的事物，更大的范围，但实际上，因为变形被宣告为仅仅是种氛围，真正的摄影师十分慎用。还原词语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诗人，从符号学角度看待词语是很后来的事了。从古典诗、文言、白话诗到现在，只在改变身份这点上，日益进行着世俗化的斗争，最后，成为最无关紧要的文化消费，文字搅和着辩证法，成为一种游戏，既不能造就宗教意义上的神话，也不能造就世俗神话——往往诗人，内在上却是反诗歌的，从胡适到北岛（还有更多作家）所延续的那种失败感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从个人谦逊来看待它，实际上这是词语符号系统对现实支配性框架的话题。仅从这点看，诗早已名存实亡。说不定，早在诗人反抗传

统形式之时，诗对现实支配性的框架就已解体。它只在文学改变现实的幻想中存在。很长时间，诗人都夸张地把诗和文化内爆相提并论。但那是错觉，诗其实只是文字表现的一种样式，在某个时候，它会很扯眼球，成为焦点，成为评判社会的载体，但并非全部。文化内爆是存在的，按麦克卢汉和波德里亚的观念看，但都只提到了更大范围的文字和印刷方式。仿象的三个等级，艺术是个统称，包括了文字和印刷术本身。

若机械地转移话题，那么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迄今，伴随印刷的革命，都具有那种“生产”的特征。既然是生产，就有生产线，产品类型，车间，专业分工，标准，于是就有了社团，口号，用郭沫若的话说，就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这些幌子，一直打到现在，直到有气无力，反文言式、罗曼司式、歌颂新文化式、大众式、反叛式、复古式、朦胧式、民间式、知识分子式……都标榜和现实的正确关系，都标榜自己的月亮最圆，单独的月亮从各个角度看，其实都不圆——所以又都是幻想的形式，甚至根本就没有触及到文学仿真这样的话题——所以，都——被边缘化，或被淘汰。职业诗人的身份现在是不存在的，“仿古崇高”并不能解决自身的危机感，大家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但，诗又常常被用来表明某种身份，品位，分类，延续新文化运动的幻想，于是就有了诗歌可笑的策略和微型商业。也很有可能，它会寻找到自己的仿真模式，但大致不会通过身份这种方式，而是认知的方式，表现的方式。所以，传统的看法，身份的错误握持，制造意识形态的阴谋，只能更深地导致诗的衰迈，让过去的古典行径和身份越来越小丑化。比如，诗歌拟像时代之式微，是明摆的，那不是诗的问题，是后现代文化形态本身的格局。但有的诗人降格以求则宁可选用低俗手法，幻想打破此种格局，像袒吟裸诵一类。这些唐代以来就有的古典小伎俩，裸奔佯狂一类——用制造丑闻事件来扩大影响，既不能力挽狂澜，反还会以无赖的姿势贻笑众人，让人想起齐泽克那个关于左翼右翼知识分子的著名比喻——傻瓜和

无赖。关于后者是这样的：有个鞑靼骑兵在乡间偏僻的小路上遇到一个俄罗斯农夫和他的妻子，那个骑兵不仅要和农夫的妻子性交，为了加深侮辱，还命令农夫在他奸污其妻子时扶着他的卵蛋，这样就不会被地上的灰尘弄脏。骑兵完事后绝尘而去，农夫开心地笑出声来。他妻子问他，见自己的老婆被强奸，怎么还会这么开心？农夫回答说：亲爱的，我要了他呀，我并没有真扶着他的蛋，现在那玩意上全是尘土和污泥³⁵。

用非诗手段强调诗歌，等于就是通过幻想往诗歌敌人的卵蛋上抹灰。齐泽克认为，这种通过剩余快感——快感即被剥削者，是仆人为自己的臣服领取的报酬——获得支持的行径，其实是具有依附性的，所以，也就不具有反环境的意义。诗人们常常大量地写镜子，利用镜像，但从里面却并未看见自己的反像，恍惚只是踏勘游戏的位置，文学和社会的反环境并未成立，还是词。胡适、卞之琳那代人，或许面临的是胡适后来所说的那种“意外的转向”——文艺复兴遇到了政治运动，而政治运动持续下来，则转为生产，于是，到这代人，又有了新的难题——生产让诗歌索然寡味，更像是劳动号子。

文学，尤其诗歌，在它的滥用和自损之下，已不再具有改变、甚至影响我们精神的力量了。如果，它还有一些秘密，那可真是一种恭维。

为了省事，我不妨再挪用一下齐泽克在论述知识分子时进行的那番神话分析。如果我们牵强附会地把胡适那代比喻为俄狄浦斯，那这代人，自然就要充当问题颇多的哈姆雷特。区别在于，俄狄浦斯完成弑父行为是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哈姆雷特则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里又有两种可能：知道这事，不再去做；或，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仍然要做。凡视诗为青春产物，或受制于心情，社会，年龄，表达形式个人偏爱变为迟疑不前或放弃，属前者，此类多转为世故小说，更容易获奖赚钱的勾当。后者，则又有两种类型（相反的解读）：一种态度是故作道德堕落而表现愤世嫉俗，我遇到的这类混混，喜欢标榜自己是人渣、酒鬼、

粗俗、民间、有匪气——那又怎样，这就是生活。其实，他们忘了，那只是生活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侧面，最消极的侧面。这些人，很难跟他们正儿八经地说话，酷爱反讽，好以“引车卖浆者流”的身份，杜撰一个“文言群”——更准确地说，是文绉绉的保守的社群，或菁英知识分子阶层，仿佛霍拉旭、波洛涅斯、奥菲利娅一类。由此我们最能看出，“俄狄浦斯”一代的贻害。比如鲁迅有“雅人和俗人”之分，胡适则是文言人和白话人之分。英雄和败类，前进与后退，经过简化，也成为意识形态用二分法正经看人的庇护所，其结果，使新文化运动变得小气，也扑朔迷离起来。

我最关注的反倒是最后一种类型，他们的坚持，说明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他们所表现的是和愤世嫉俗相反的那种激进态度，带着明显的悲剧意识——也就是齐泽克分析的，出于“无情的道德命令，我还是不得不做”，或我不得不写。我熟悉的许多诗人大致都在这里，牺牲的海子——他真正的牺牲，不是其悲剧式的卧轨，而是，生者没有探讨清楚，那“无情的道德命令”来自何处；还有一类为数不少，非常固执地幻想能够用诗——哈姆雷特也用诗，但最后还是用了剑，而且，不在背后用剑，必须面对面，挑战极权主义者克劳狄斯。这类人，写作技巧非常薄弱，使用的词语也多为大众哲学流行术语中的乌合，个人悲剧色彩浓厚，对革命与集权之间的轮回与弊害多半语焉不详。甚至按“超意识形态”规律——意识形态的可操作性，乃在于对其具体形式每个个体的凝视，稍不小心，其所作所为，就可能沦为跟随主体的帖子——也就是，许多人担心的，连他们的不认同也被政治化了。在诗歌中，那些曾被人们生背熟记的名句，在后现代的裹胁之下，也早为社会实际所倡导，进入了教科书。这并非什么时过境迁，或文化逆转，而实际上一开始，法律和违约就相互成为彼此欲望的目标。当代诗歌，并不怎么解读符号下面的东西，所以，更不消说，诗歌作为意识形态的违约，在什么程度上是依赖它所违约的对象，诗的“色情化”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我耳

闻目睹许多人表达过这点，多数人则视而不见。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傻瓜和无赖的话题，这对现在仍不乏余力的诗人来说，境况非常复杂。

我一直相信，在我以往岁月中所遇到的优秀诗人们，都比我成熟。他们至少有方位感，有界限，谙练自我之重要，能“洞悉”一切，能绘声绘色描述遇到的事物，通晓调情与政治，语言裹得紧紧的，虽教育不足，却滴水不漏，机灵而颇有幽默感，掂量风险利弊的技巧惊人，就像北岛在诗中所暗示过的，有人在地平线上，有人在地平线下（匿名者），也有人在中间突然嚎啕大哭。我大概属中间者，但不必嚎啕，只需幼稚多静观，多点孤独。

上面说的“成熟”有两层含义：其一，葺茅编茨，指种种的成长，成功，人生的，诗艺的，精神的，不一而足。这点，我一向奔走相告，不遗余力，只要正点，均引以为豪。我惊讶众多诗人，在“俄狄浦斯”一代没留下什么玩艺的境况下，竟深化了汉语现代诗的表现力，除个人天赋，多归功于历史。乃至西方汉学中最挑剔者（比如顾彬先生）也坦陈，朦胧诗是中国当代文学惟一保持国际水准的。尽管价值指向未明，薄言及表，泛陈乏细，也算小可慰人；其二，成熟所付出的代价，谁知道会不会又是个轮回。“俄狄浦斯”已演绎过一回，哈姆雷特会不会重蹈覆辙？此时，价值体系冲突更甚，拟像时代较之唐虞孔教或新文化时代更为迅捷，更为复杂，激进者演为中产阶级；提倡新文化，关注民众素质者，沦为泼粪者，岂止二元，三元也绰绰有余，身份丧失，仁者不仁，或许正是成熟的代价。时过境迁，即使是单纯的人，单纯的事，正确的人，正确的事，做出来也恍惚严重错位。

比如，我所一直敬佩的《今天》杂志³⁶，就是一例。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创刊以来，《今天》在这代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意识形态的隔离而成功沟通，曾是一个不错的反环境，为文学的理想主义者提供了暂栖之地，不说安身立命，至少也是条界线——河那边？有